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中的人媒关系

张 骋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 要:网络短视频的互动传播是我们重新理解人媒关系的一个重要样本,因为在人与短视频的互动过程中,人也在被节点化和数据化。同时,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所依赖的新兴媒介技术也在凸显身体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实现身体的节点化和数据化。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将节点化和数据化的身体视为复杂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并与其他行动者共同组成一个动态变化的网络。这种作为行动者的身体拥有肉体 and 机器的双重逻辑。这种双重逻辑使得身体和媒介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可以作为网络的一部分与其他媒介相联结。在此逻辑下,媒介不是身体的延伸,反过来身体成为媒介的延伸。

关键词:网络短视频;行动者网络理论;身体;媒介;人媒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4)11-0072-07

DOI:10.13713/j.cnki.cssci.2024.11.014

近年来,随着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网络短视频的不断发展壮大,网络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娱乐消遣的主要渠道之一,受到各个年龄段人群的青睐。网络短视频独特的传播特征自然也就成为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网络短视频的所有传播特征中,互动性是被研究者提及最多的传播特征之一,也通常被研究者视为网络短视频区别于传统视频最主要的传播特征。已有的研究对于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的研究主要是从互动仪式链等理论出发,探讨如何利用互动性来增强网络短视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问题,进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如果我们对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此,就会错过通过网络短视频的互动传播来重新理解人与媒介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样本”和

契机。人与媒介的关系在学术史上经常被阐释,其中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该论断认为,媒介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感觉器官或多种感觉器官的延伸,这种延伸能够扩大身体的感知范围。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我们身体和官能的延伸,无论衣服、住宅或是我们更加熟悉的轮子、马镫,它们都是我们身体各部分的延伸。为了对付各种环境,需要放大人体的力量,于是就产生了身体的延伸,无论工具或家具,都是这样的延伸。这些人力的放大形式,人被神化的各种表现,我认为就是媒介。”^[1]但是,当网络短视频的互动传播在重新构造“人”,也在让我们重新理解“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媒介(身体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基金项目: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电影强国建设背景下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伦理建构研究”(22EC196)。

作者简介:张骋,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视听、新媒体传播、传播理论。

一、“节点人”与“数据人”:网络短视频交互传播中的“人”

网络短视频的互动传播就是指人与短视频之间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作为网络短视频的观看者和使用者的“人”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人”正在被节点化和数据化。

(一)节点人:作为网络节点的人

节点人的出现源于新媒体技术发展到 Web2.0 时代,即移动互联时代。在 Web1.0 时代,新媒体仍然延续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只是传播的速度比传统媒体更快,传播的信息量比传统媒体更大,但是传播主体仍然是专业化、职业化的媒体机构,传播过程仍然是“点对面”的单向线性传播。到了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 Web2.0 技术“激活了比机构更为基本的社会基本要素——个人,使每个人都成为这个传播系统其中的一个元素、一个基本单位。”^[2]这种对“个人”的激活使得传播主体不再是专业化的媒体机构,而是业余的个体,换言之,每个人都是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主体,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利用手中的麦克风自由地进行表达、交流和创造。同时,传播过程也不再是“点对面”的单向线性传播,而是“点对点”的双向互动传播。

进而言之,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过程不再有“传播者”与“受众”的区分,只有一个个的“节点”。这些节点同时具有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三重功能。并且,每个节点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对等的,可以进行平等的交流与互动。马克·波斯特将这种“以媒介的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为一体的双向型、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为主导”^[3]的时代称为第二媒介时代。“互动与自由”是第二媒介时代最主要的两个基本特征,网络短视频就是第二媒介时代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具有的点赞、转发、评论、关注、发弹幕等传播方式就很好地体现了“互动与自由”的传播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把处在每个节点上的人称为“节点人”。具体而言,“节点人”的传播模式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以每个节点人中心。由于节点人同时扮演着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三重角色,所以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是一个传播中心。我们可以将这种以每个节点为传播中心的传播模式称为“泛众传播”,即“以每个个人为中心、面对所有人提供

的个性化传播,既‘有众’又‘无众’,既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也是一对一的传播。”^[4]这里的泛众与大众传播中的大众不同,因为大众传播通常只针对一对多的传播,而泛众传播是指一对多、一对一、多对多、多对一同时存在的传播。在泛众传播中,传播网络中的每个节点既是传播中心,又是被传播的中心;每个节点都可以影响到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同时也受到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影响。

网络短视频中的网络直播就是解释这种以每个节点人中心的泛众传播的最好例证。在网络直播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直播者,每个直播者都是一个节点人,也是一个传播中心。围绕着这个传播中心,作为节点人的直播者既可以对外传播,又可以对内接受。也就是说,这个传播中心既指传播信息的中心,又指接受信息的中心。比如,每个网络主播既可以针对所有人进行“一对多”的传播,又可以针对一个特定粉丝进行“一对一”的传播与互动。同时,所有人也可以针对这个主播进行“多对一”的反馈、赞美、攻击等。而且,所有粉丝也可以与所有粉丝进行“多对多”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个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每个节点人又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网络主播。

第二,以社交关系为渠道。在“节点人”的传播模式下,信息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为渠道进行流动的。社交关系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信息流动的广度和深度。网络短视频具有的点赞、转发、评论、关注、发弹幕等传播方式使得节点人与节点人之间就可以以各种方式结成关系纽带,这些关系纽带又可以组成一个关系网络。每个节点人就可以依靠这个关系网络构建自己的社交空间。与传统封闭的社交空间不同,节点人的社交空间是动态的、开放的。节点人可以依靠关系网络任意地扩大或者缩小自己的社交空间,节点人的主动性和存在感得到增强。

这种增强主要体现在:作为关系节点的个体可以通过一个个的节点,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所有节点的个体。同时,作为关系节点的个体,受到其他所有节点人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也更深。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短视频来发布内容,并不断地经过其他节点的转发和分享,形成裂变式传播,进而影响越来越多的微博和微信用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的社交网络时代每个节点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红和明星的重要原因。同时,经由不同的节点人组成

的社交网络也可以承担内容的筛选和过滤功能,进而实现用户信息消费的个性化和精准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信息爆炸的社交网络时代反而还容易形成“信息茧房”的重要原因。

(二)数据人:对人的数据化描绘

到了大数据时代,人随时随地都在被数据化,都在被数据和算法所“计算”。这种人的数据化的过程就是要将人的动作、行为、状态、思维等一切活动全部变成抽象的数据,然后根据算法对人进行重新认识和描绘,进而实现人的数据化生存。

数据化生存就是还要让数据可以成为个体的替身,让人们通过数据对自己和他人能有更加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而不仅仅是让数据记录个体的行为和思想。进言之,要实现数据化生存,首先需要让数据能够自由地传播和获取;然后需要有能够随时随地处理这些数据的智能设备;最后这些设备不仅能够处理和分析数据,还能够自我学习和自我升级,进而代替人来独立地应对这个世界,并反过来影响人类的思考和行动。

在大数据时代,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以及随身携带的可穿戴设备,使得几乎世间万物都可以被量化,都可以被转换成数据。这些数据通过被搜集、整理、运算之后,可以将生活转换成各种指标。这些指标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例如,运动手环可以记录我们每天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这些卡路里相当于多少食物的热量,这些数据可以提示我们每天需要摄入多少热量,消耗多少卡路里,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睡眠手环可以记录我们每天的睡眠质量,可以记录我们每天晚上有几个小时的优质睡眠,这些数据可以提示我们每天晚上几点入睡,早上几点起床,才能保证优质的睡觉质量。

除此之外,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可以被转换成数据,都可以被量化。这样,一个“数据人”将被建构出来。这个“数据人”包括我的身高、体重、三围等外在数据,也包括我的爱好、心情、观念等内在数据。外在数据与内在数据结合而成的“数据人”将成为一个比我更真实的我,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数据人”对自己有更加准确、全面的认识。同时,人工智能的算法就可以将各行各业都打通,将各行各业都变成数据行业,这样,也能促使不同行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至此,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从人依赖数据生存,到人成为数据系统的一

部分。这种转变将使人丧失处理数据的能力,只能将分析和处理数据的任务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正如赫拉利所言:“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5]。

在网络短视频的互动传播过程中,数据人的数据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一是用户被动产生的数据。例如,用户在注册一个自己的短视频账号的时候,注册的过程就要向平台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就可以被转换成数据。这些信息显然不是用户主动想要提供的,而是被动提供的。

二是用户主动产生的数据。例如,用户在网络短视频中主动发表的内容,以及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主动产生的转发、评论、点赞、发弹幕等行为,都可以被转换成数据。这些就是用户主动提供的。

这两种类型的数据共同完成了对于个体的记录和描绘,共同完成了对于“数据人”的构建。至此,这些数据就可以被网络短视频背后的服务商所用,进而推测出用户的现实属性,向用户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下面,具体地分析网络短视频背后的服务商是如何对人进行数据化描绘的。

在传统媒体时代,网络服务提供者也要对人进行数据化描绘,但是由于获得数据较为困难,再加上技术不够先进,对人的数据化描绘只能是模糊的“群像”。而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对人进行较为清晰的数据化描绘。

我们对人进行数据化描绘,其目的是揭示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政治倾向、经济状况、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进而针对这个人进行信息和产品的个性化推送。具体而言,在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过程中,对人进行数据化描绘主要依赖以下三种数据:一是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主动提供的个人信息;二是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公开发布和分享的内容;三是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浏览记录和购买行为。这三种数据基本可以协助我们完成对于个体角色、地位、特征的描绘。

此外,正如每台智能手机都可以被定位一样,每个个体也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对于个体位置的测量可以使我们对个体的描绘更加准确、全面。具体而言,对于个体位置的测量主要包括测量个体的物理位置和社会位置。物理位置是指个体主要的活动空间,包括个体的住所、工作地点、经常

去的场所,经常路过的街道,等。对于个体物理位置的测量可以了解个体的空间特征,然后网络服务商可以根据这些空间特征为个体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例如,抖音短视频可以为你推送空间上与你邻近的朋友的视频。除了测量个体此时此地的位置之外,网络短视频服务商还可以预测个体未来可能的活动空间和行动方向,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同时,个体的社会位置是指个体在其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包括该个体的人脉关系、社交圈子、朋友圈子、社会资本等。当前,已经有一些网络短视频服务商将个体的社会位置作为重要的参照标准加以考量。例如,抖音短视频就可以根据你手机通讯录里面的好友为你推送好友的视频,也可以根据你的抖音好友为你推送可能认识的人。

二、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中身体的回归

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不仅重新塑造了“人”,与此同时,还凸显了身体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所依赖的新兴媒介技术能够重新将身体激活。笔者在这部分将重点分析身体为何在主流传播学中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以及身体如何在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中实现回归。

(一) 主流传播学对身体的忽视

身体一直都是主流传播学忽略的研究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从时代背景来看,主流传播学形成于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一直都将传播视为精神交往活动,与身体无关,甚至身体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对象,因为大众传播认为想要实现远距离的信息传播就必须摆脱身体的束缚。正如彼得斯所言:“‘交流’这一新观念容许肉体不在场而实现接触,这种接触对交流者(动物、人、机器)的身体形式并不关注,甚至对交流者‘是否存在有机体’都无所谓”^{[6]351};二是从思想根源来看,“主流传播学的去身体化趋势,不能仅仅从大众传播征服身体与空间实践的现实中观照,更要看到,这种来源于现代性哲学思想的理性意识主体观,构成了学术脉络层面的深层次原因。”^[7]也就是说,主流传播学持有的“去身体化”的理论观点可以被视为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哲学的产物。

针对传播学研究中的“身体缺席”问题,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一书中探讨了“身体在人类交流中可以多大程度保持缺席”这个问题。他在梳理了从古希腊到近现代人类传播观念中对待身体的观念之后,得出结论:“过去的交流成功标志是触摸灵

魂,现在是触摸肉体。”^{[6]351}也就是说,在彼得斯看来,虽然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后,远距离的精神交流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和普遍,但是身体在场仍然是确认交流是否成功的前提。进言之,他认为是身体的排他性让身体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身体在场的交流表明“我”把这段时间排他性地给了“你”,“我”也就不能同时跟其他人对话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异地恋和网恋总是不能带给人们安全感,网课和网络会议总是不能达到良好效果的原因。

事实上,主流传播学并不是完全没有探讨过身体。首先,麦克卢汉就是最早开始谈论身体的传播学家,他提出的著名命题“媒介即人的延伸”,旨在阐明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是对身体一个器官或多个器官的延伸,虽然麦克卢汉是在以身体为尺度来阐释媒介,但是他的思想依然可以为我们考察身体与媒介的关系提供参考;其次,基特勒的媒介考古学也在探讨机器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与麦克卢汉不同,他主要从技术的视角来考察身体。他认为,我们的身体在使用机器的时候也会被整合进机器系统中去;最后,主流传播学中的控制论也在关注传播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在控制论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动态平衡、反身性、自创生系统等核心概念的更迭,人机边界的结构和范围被不断界定,从反馈回路到将观察者纳入人机关系系统再到碳基与硅基生命形式的并置,但总的趋势是以信息流的方式定义身体与机械体的交互,这是实现跨介质传播的逻辑起点。”^[8]

虽然主流传播学也探讨过身体问题,但是并不成体系,因为只要涉及大众传播的相关议题,参与传播的传播主体和受众都是被抽离了身体的意识主体。究其原因,与大众传媒诞生的时代有关。

如果我们考察大众传媒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诞生和发展与人类的前三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印刷术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使得文字印刷品成为第一种大众传媒;电力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使得广播和电视成为大众传媒;计算机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使得电子计算机成为大众传媒。这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大众传媒都是在尽可能地切割和分离我们的身体感官。例如,文字印刷术将我们的视觉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广播将我们的听觉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电视将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从身体中分离出来。正是这种切割和分离使得传播学不再关注我们整全性的身

体,仅仅关注脱离了身体的意识主体。

这一点在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经验学派的研究框架基本上是围绕着拉斯韦尔的“5W”模式展开的,拉斯韦尔的“5W”模式确立了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关于传播者的控制研究;关于传播内容的内容研究;关于传播渠道的媒介研究;关于接受者的受众研究;关于传播效果的效果研究。这五大研究领域都将传播视为脱离了身体在场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由于脱离了身体的束缚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另外,传播学批判学派虽然提到过身体,但都是去挖掘身体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机制,没有真正去关注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二) 新兴媒介技术驱动下身体的回归

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就是身体在传播学中被重新激活的重要契机,因为新兴媒介技术将过去被传统媒体分割的身体重新整合起来,可以实现身体在场的传播实践。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就旨在表明媒介技术在分割我们的身体,正如他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地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9]媒介技术对于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的改变其实就是在分割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的某些感官被延伸了,就必然会遮蔽身体的其他感官,例如,报纸延伸了我们的视觉,也遮蔽了我们的听觉、触觉等其他感官。但是,麦克卢汉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不仅会分割我们的身体,还会重新整合我们的身体,制造出虚拟的身体,创造出多元的身体在场方式。比如,QQ 头像、聊天表情包、游戏角色等图像化的身体;VR 技术制造的沉浸化的身体;AR 技术制造的全息投影的身体;人工智能技术制造的赛博格身体。这些新型的身体在场方式可以制造出新型的身体感知方式。例如,“在虚拟实在的时代里人们越来越容易感受到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任意时间在多样的世界里进进出出,能够溜进任意一个物体,它使物体和个人的认同性之间坚固的束缚被打破了,人们至少能够暂时离开身体这个监狱。”^[10]由此可见,这种新型的身体感知方式可以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实现身体的虚拟远程在场。这种在场方式实现的就不仅仅是视觉的沉浸,而是整个身体的沉浸,使得我们的新型身体可以游走于多重时间和空间之中。身体在场的传播与交流方式也就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

传播实践中。

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为渠道进行的。这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使自己处在他人的凝视之下,这就正好为消费社会中的镜像化身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搬到这个展示平台之上,可以满足其他人窥视他人日常生活的欲望。这种窥视欲的满足离不开对于身体的展示、塑造、规训。

网络短视频中的身体展示就是人们通过各种美颜和修身的方式和技术来塑造和规训自己的身体,将经过符号化的身体外观和形象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上展示出来,通过理想的身体来表达理性的自我。同时,这种理想的身体也是在其他人的凝视之下经过不断修正塑造出来的,它需要适应互联网的生存法则,也需要迎合作为其他粉丝的审美标准。可以说,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中的身体可以将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化身体展示到极致,因为短视频不仅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个身体展示的平台,而且智能手机美颜技术的迭代可以不断地满足我们的个性化需求,塑造出理想的身体。这种理想的身体可以发挥身体叙事的作用。

所谓身体叙事,是指“以身体作为叙事符号,以动态或静态、在场或虚拟、再现或表现的身体,形成话语的叙事流程,以达到表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11]在网络短视频中,人们将自己的身体打上记号,以视频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身体实践,使其成为符号性的、叙事性的身体。正如布鲁克斯所言:“身份及其辨认似乎有赖于标上了特殊记号的身体,它俨然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能指。记号在身体上留下了烙印,使它成为一个指意过程中的一部分。给身体标上记号,这意味着它进入了写作,成了文学性的身体,一般说来,也就是叙述性的身体,因为记号的刻录有赖于一个故事,又推演出这个故事。”^[12]由此可见,网络短视频可以将每个人的身体在公众视野中展示出来,使其承担表意、叙事、传播的功能。

三、身体即媒介的延伸:基于网络行动者理论的分析

笔者在第一部分论述了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塑造的“节点人”和“数据人”,尽管这两种人有所差异,但是都实现了人的网络化和媒介化,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在第二部分

论述的是身体在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中的回归,我们在短视频中展示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将身体纳入社交网络,进而实现身体的网络化和媒介化。以上两部分的论述促使我们不得不在这部分重新思考身体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严格来说,当我们的身体在网络短视频传播过程中被展示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身体,而是被整合进媒介运作体系的身体,也就是说,已经成为节点人的身体和数据人的身体。这种身体拥有肉体和机器的双重逻辑,使得身体和媒介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可以作为网络的一部分与其他媒介相联结。这样的身体就可以被视为媒介,因为至少在目前的状态下,很多信息和数据的传递、很多关系的连接都需要依靠身体(行动轨迹、手指运动)这个媒介才能完成。于是,麦克卢汉的论断“媒介即人的延伸”就可以被修改为“身体即媒介的延伸”。

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出发,亦可以发现身体是如何成为媒介的延伸的。拉图尔的ANT理论与我们所熟知的传统网络理论不同,它并不将网络视为社会联结的结果,而是将网络视为社会联结的工具。他以铅笔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传统网络理论中的网络是铅笔绘制出的那张网,而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网络是那支绘制的铅笔。

由此可见,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基本出发点是任何既定的社会现实都是一系列复杂关系网络的产物。在这个复杂关系网络中,有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转义者、网络。虽然这三个概念在传统网络理论中也经常出现,但是拉图尔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其中,行动者被他赋予了能动性。在他看来,传统网络理论往往站在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之上,将行动者视为处于某个结构位置之上而被动执行特定功能的人。这样的行动者就像一个黑箱,只能产生给定条件的结果,不具有能动性。拉图尔认为,行动者是具有能动性的,能够主动制造差异而改变事物的状态。第二个核心概念转义者就是对行动者最好的说明,在拉图尔看来,所有行动者都可以被视为转义者。与转义者相对的是中介者,后者就只能算是一个黑箱,只要限定输入就能确定输出。而转义者能够主动理解其他行动者的需求和问题,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将这些需求和问题转换过来,进而将不同行动者联结在一起,相互理解、相互作用,形成行动者网络。同时,拉图尔认为,行动者还具有广泛性,凡是能够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

起作用的因素都可以被视为行动者。这里既包含人类行动者,又包含非人类行动者。他还特别强调了非人类行动者的关键作用,这样也就消解了传统的人与非人、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它们都是网络中的元素,在网络中相互作用,交互共生。最后,“网络”这个核心概念表明“资源集中于某些地方——节点,它们彼此联接——链条和网眼:这些联结使分散的资源结成网络,并扩展到所有角落。”^[13]拉图尔使用这个概念就是要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联结起来,以同等的身份一起纳入到科学实践之中。这样也就避免了传统社会学关于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划分,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具有同等的地位,没有任何一方被赋予了优先权。这样的网络就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如互联网,也不是结构意义上的网络,如对社会结构的表征,而是对社会连接方式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强调的是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

从行动者、转义者、网络这三个核心概念来看,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解决特定问题的一个动态过程。当这些行动者联结在一起之后,一个既定的社会场域才得以形成。因此,拉图尔认为:“我想要做的就是重新定义社会,让它重新回到网络中。”^[14]¹¹他进一步指出,所有的行动者都没有固定的本质,都只是一种关系性效应,其身份和作用都只能在其所处的关系性网络中得到锚定。也就是说,单独的行动者不起作用,行动者只能在与其它行动者的联结过程中才能行动。因此,拉图尔将行动者都称为“准客体”,即自身包含行动可能性的行动者。同时,“社会”“网络”都不是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随着行动者的运动、替换、变形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就消解了结构与能动之间二元对立的困境,社会和网络的形成并不完全是主体能动的结果,也不完全由结构决定。正如拉图尔所言:“一直以来,人们对行动者网络理论都持一种误导的观点,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冠以‘庞大叙事’、‘欧洲中心论’甚至‘霸权主义’的标签。实际上,消解、解构和重构都不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想要达到的目标,而是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要极力避免、克服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过程和概念召集和重新联结‘社会’。”^[14]¹⁰

如果我们基于ANT理论来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首先,应该摒弃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将人与技术都视为复杂关系网络中共同起作用的

行动者;其次,我们在关注作为人的行动者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是人的身体,而非人的思想,因为人的思想与技术之间只能形成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彼此之间不能形成相互联结的关系。而身体与技术都具有物质性,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彼此之间能够相互联结、相互塑造。也正是在身体与媒介相互联结、相互塑造的过程中,身体逐渐被媒介化。这就是说,“技术媒介通过将人的身体及其行为、活动内容进行数据化后将主体编制进技术系统,以此对现实世界中的主体进行规约和限制。简言之,媒介通过作为媒介的身体而获得身体及身外世界的信息,全面建构起新的连接关系和传播形态,创造出人类新的生活世界。身体和技术一起,开创了新的社会尺度。”^[15]

在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过程中,节点人的身体和数据人的身体就是身体媒介化的最好例证。节点人的身体就是人们在网络短视频直播中展示出来的身体,这个身体不仅仅能被用来展示,更重要的是它能作为网络节点上的行动者而存在,进而将自身与处于其他节点上的行动者联结起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一个动态的网络。例如,我们通过抖音直播展示自己的身体,可以实现直播交流和直播带货。直播交流和直播带货的过程也就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构筑网络的过程。数据人的身体就是人们在使用网络短视频的过程中被其背后的大数据算法监控到的身体,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自己的身体(手指运动、行动轨迹、声音等)去感知网络短视频的时候,身体也就作为行动者被接入网络,并源源不断地为处于其他网络节点上的行动者生产自己的身体位置数据和身体轨迹数据。这些数据就能成为网络行动者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的依据和基础。例如,当我们在刷抖音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数据就能被抖音背后的服务商和运营商标识,我们与这些服务商和运营商就都成为网络行动者,彼此之间进行个性化、精准化的互动,这个互动的过程也就是构筑网络的过程。

事实上,无论是节点人的身体还是数据人的身体,它们背后的逻辑都是:每个人的身体都通过网络短视频被编织进一个巨大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进而与其他行动者共同组成一个动态变化的网络。至此,身体的存在方式就被重新定义,成为肉体 and 媒介技术交织的产物。这里的身体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身体,而是被重构的电子身体。于是,该身体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媒介,该媒介能将人与人、人与物连

接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动态的网络和社会。

总之,当身体被接入网络,成为网络的一部分,发挥其作为行动者的作用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被视为一种媒介。即,网络短视频互动传播中的节点人的身体和数据人的身体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媒介,因为节点人的身体实现了身体的网络化,数据人的身体实现了身体的数据化。网络化、数据化使得身体拥有肉体 and 机器的双重逻辑,身体与媒介的边界被消解,身体成为媒介的延伸。

参考文献:

- [1]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9-40.
- [2] 喻国明. 媒介革命:互联网逻辑下传媒业发展的关键与进路[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3.
- [3]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范静哗,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
- [4] 李沁. 媒介化生存:沉浸传播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20.
- [5] 赫拉利.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35-336.
- [6] 彼得斯.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 邓建国,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7] 孙玮. 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 国际新闻界,2018(12):83-103.
- [8] 刘海龙,束开荣.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0-89.
- [9]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6.
- [10] 西皮尔·克莱默尔. 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M]. 孙和平,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5.
- [11] 郑大群. 论传播形态中的身体叙事[J]. 学术界,2005(5):183-189.
- [12] 彼得·布鲁克斯. 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 朱生坚,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4.
- [13]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郑开,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19.
- [14]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5] 张华,杨荣智. 身体是媒介的延伸:媒介与身体关系视角下的“时空伴随”[J]. 中国报业,2023(1):36-38.

[责任编辑:郑迦文]